

战后初期“中华民国政府” 对留日学生政策解析

——游离于救济与召回之间的政策之成败

[日] 王雪萍*

序 言

1945年日本战败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其中特别是对战争结束时仍居住在对方国家的人们而言，其所带来的变化是令人难以想象的。1945年8月15日，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不仅有为数众多的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华侨、战俘和劳工，还有很多从日本殖民地中国台湾省以日本人身份赴日的民众。虽然至今对于战后初期生活在日本的来自中国的民众人数未能找到一个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根据GHQ（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遣返在日外国人的数据等大约可以推测出其概数。根据该资料，战后至少有85692名中国人生活在日本，在1945年至1948年期间，有65885名中国人回国。^①另外，根据陈来幸的调查，在1948年3月以前，在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以下：驻日代表团）登记在册的在日中国人33148人之

* [日] 王雪萍，日本东洋大学社会学部副教授。

① 竹前荣治、中村隆英監修：《GHQ日本占領史 第十六卷 外国人の取扱い》，东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6年，第20—42页。

中，大陆人有 19725 人，台湾人有 13433 人。^① 从以上两个调查我们可以了解到战后初期在日本的中国人人数一直维持在数万人的规模。

在日本的殖民地台湾省出生的民众，在日本战败前一直是以日本人身份生活在日本的，但战争结束后随着台湾回归祖国，在日台湾民众的身份也随之发生转变，经历了一个从日本国民的身份恢复为中华民国国民身份的过程。而当时在日本的中国劳工、战俘等大都是在战争期间被带到日本的中国军人和劳工，他们在日本没有生活基础，日本战败以后又失去了工作，生活极其困苦，因此他们中大多数人选择乘坐 GHQ 提供的遣返外国人的船只回到祖国。^② 故遣返外国人的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后，实际上还留在日本的中国人大多为留学生和华侨。华侨家庭多是从战前已经经过了几代人在日本的打拼，谋生有方，具有一定生活基础。而中国留日学生，^③ 多数是在战争期间到日本留学，其中更有许多是由台湾、伪满洲国、汪伪政权等殖民地政府和日本伪政权派遣赴日的。由于日本战败，为他们提供生活来源的派遣政府也随之垮台，同时中日两国之间的汇款业务也被停止，故而他们也无法得到其家庭的援助，只能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窘境。^④

战后的日本，在 GHQ 的占领下，经济、社会持续混乱。在此情况下留日学生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日本各地相继组织了中国大陆及台湾的留日学生团体。这些留日学生团体，最初是由大陆和台湾学生分别成立的，

① 陈来幸：《戦後日本における華僑社会の再建と構造変化——台湾人の台頭と錯綜する東アジアの政治的帰属意識》，小林道彦、中西寛編著：《歴史の桎梏を越えて——20 世紀日中関係への新視点》，东京：千倉書房，2010 年，第 189—210 页。

② 竹前栄治、中村隆英監修：《GHQ 日本占領史 第十六卷 外国人の取扱い》，第 19—26 页。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会：《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东京：日本僑報社，2004 年，第 233—241 页。

③ 关于战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称呼，在当事人和研究人员之间有各种不同的叫法，在本文中使用了在中华民国“外交部”和“教育部”档案和留学生发行的报纸杂志中使用最多的“留日学生”的称呼。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留日学生”即指在日中国留学生。

④ 川岛真：《日本占領期華北における留日学生をめぐる動向》，大里浩秋、孙安石编著：《留学生派遣から見た近代日中関係史》，东京：御茶ノ水書房，2009 年，第 213—238 页。川岛真：《過去の浄化と将来の選択——中国人・台湾人留学生》，刘杰、川岛真编：《一九四五年度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 年，第 31—51 页。

并各自扩大自身力量。但在从1945年底至1946年春的短暂期间内，大陆和台湾的留日学生团体迅速进行了统合，于1946年5月22日成立了全日本大陆和台湾留学生的统一团体“中华民国留日同学总会”（以下简称：同学总会）。同学总会的成立，是一项具有象征意义的大事。^①当然，留日学生团体的统合过程，在同学总会成立以后仍然在继续，但其成立本身就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其后于1947年春开始发行同学总会的机关报《中国留日学生报》^②（以下简称：《学生报》），主要报道与中国有关的信息、各地留日学生的动向等。《学生报》不仅发送到全日本的留日学生手中，还发送到一部分华侨子弟手中，因此《学生报》很快就发展成为在留日学生、华侨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报纸。其后《学生报》逐渐引起了GHQ及驻日代表团的注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也了解并注意到它的作用。^③同学总会成立之初，其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广大留日学生的基本生计问题，为了解决留日学生的生活救济问题与GHQ、日本政府、驻日代表团协商^④。特别在从战后初期至1949年，拥有中华民国国民身份的留日学生，能够领取到为盟国国民准备的特别配给，同学总会及其“下部组织”的各地同学

① 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会：《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东京：日本僑報社，2004年，第59—60页。

② 经笔者确认，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机关报于1947年1月创刊，1947年3月10日—1947年4月30日的名称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旬报》，1947年5月1日—1948年1月30日的名称为《中华留日学生报》，1948年5月4日以后的名称为《中国留日学生报》。在本文中除了注以外，全部简称为《学生报》。本文使用的《学生报》是从以下三处收集来的，①Prange文库；②由横滨华侨陈立清先生的遗孀捐赠的资料设立的陈立清文库；③中国留日同学总会原主席郭平坦先生提供的资料。在此深表谢意。

③ 陈来幸：《在日台湾人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脱日本化——戦後神戸・大阪における華僑社会変容の諸契機》，贵志俊彦：《近代アジアの自画像と他者——地域社会と“外国人”問題》，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年，第83—105页。王雪萍：《戦後期日本における中国人留学生の生活難と政治姿勢をめぐる葛藤——救済金問題を事例に》，大里浩秋編：《戦後日本と中国・朝鮮——プランケ文庫を一つの手がかりとして》，东京：研文出版，2013年，第83—119页。林连德：《中国留日同学总会側记》，全国政协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397—404页。

④ 王雪萍：《戦後期日本における中国人留学生の生活難と政治姿勢をめぐる葛藤——救済金問題を事例に》，第83—119页。

会也都作为领取和分发特别配给的机构做了贡献。而且驻日代表团代表谢南光也曾出席同学总会的成立大会，并代表驻日代表团致了祝辞。由此也可以看出同学总会与有中华民国政府（以下：国府）驻日代表机关性质的驻日代表团有着密切的关系。^①然而迄今为止，关于战后留日学生与国府关系的既存研究，据笔者所知，只有川岛真的一篇论文。^②分析其原因可以列举以下三点：

（1）长年来，中日关系史研究以1945年的日本战败作为近代史研究之界限。因此关于1945年8月15日战争结束以前的中国留日学生，已经由历史学者发表了众多的研究成果。^③但是关于战后中国留日学生的研究，作为现代中国研究的范畴，从教育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也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但其主要集中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留学生的动向。^④

但近年以来，由于中国和台湾地区有关部门留学生的相关档案逐步开放，一些史料集也公开出版，同时The Gordon W. Prange Collection（Prange文库）的整理、在日本国会图书馆等地全面公开等也让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战后初期中国留日学生进行研究成为可能。关于战后初期留日学生与

① 谭璐美、刘杰：《新華僑 老華僑——変容する日本の中国人社会》，东京：文艺春秋，2008年，第184—186页。

② 川岛真：《過去の浄化と将来の選択——中国人・台湾人留学生》，刘杰、川岛真编：《一九四五年的历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第31—51页。

③ さねとう けいしゅう：《中国人 日本留学史》，くろしお出版，1960年。阿部洋编：《日中関係と文化摩擦》，东京：葎南堂書店，1982年。大里浩秋、孙安石编：《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研究の現段階》，东京：御茶の水書房，2002年。阿部洋：《“对支文化事業”——戦前期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の展開と挫折》，东京：汲古書院，2004年。大里浩秋、孙安石编著：《留学生派遣から見た近代日中関係史》，东京：御茶の水書房，2009年。纪旭峰：《大正期台湾人の“日本留学”研究》，东京：龍溪書舎，2012年等。

④ 岡益巳、深田博己：《中国人留学生と日本》，东京：白帝社，1995年。段躍中：《現代中国人の日本留学》，东京：明石書店，2003年。葛文绮：《中国人留学生・研修生の異文化適応》，东京：溪水社，2007年。王雪萍：《改革开放后中国留学政策研究——1980—1984年赴日本国家公派留学生政策始末》，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廖赤阳主编：《大潮涌动：改革开放与留学日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国府关系方面的研究，当属上述川岛真的论文最为详细。^① 川岛真利用中华民国教育部、外交部的档案以及同学总会的机关报《学生报》，对留日学生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概述，特别分析了国府针对留日学生的“净化”政策给留日学生造成的心理影响，同时对国府的政策与留日学生组织、学生们的思想变化之间的关系方面进行了分析。但因其论述只对国民政府和留学生双方的观点进行了概述，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

而在田远的研究中为了介绍留日学生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虽然对驻日代表团设立之后的情况进行了一些介绍，^② 但其论文主要的目的还是以《学生报》的报道为中心分析留日学生的动向，所以对当时国府与学生们的关系并未特别关注。杨子震的论文则重点分析了驻日代表团从设立到撤销的过程、组织、业务内容以及取得的成果，可以说是填补了驻日代表团研究方面的空白。^③ 但其论文主要是为了全面了解驻日代表团的工作，所以对包括留日学生问题在内的一些个别事例的分析尚显不足。此外笔者也曾就留日学生的救济金问题进行过一些论述，^④ 但其主要分析了同学总会在1948年以后为了救济金问题与驻日代表团关系的变化，距离全面了解战后初期国府的留日学生政策还相差甚远。

另外关于战后初期留日学生与日本政府的关系，田中刚也曾以日本外

① 川岛真：《過去の浄化と将来の選択——中国人・台湾人留学生》，刘杰·川岛真编：《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第31—51页。

② 田远：《戦後直後における中国人留日学生の境遇と選択：1945—1952 主に〈中国留日学生報〉を通じて》，神奈川大学大学院外国語研究科博士論文，2014年3月。

③ 杨子震：《中国驻日代表团研究——初探战后中日·台日关系之二元架构》，载《国史馆馆刊》第19期，2009年3月，第51—85页。

④ 王雪萍：《戦後期日本における中国人留学生の生活難と政治姿勢をめぐる葛藤——救济金問題を事例に》，大里浩秋编：《戦後日本と中国・朝鮮——プランゲ文庫を一つの手がかりとして》，东京：研文出版，2013年，第83—119页。

务省档案为主要史料进行过分析,^① 笔者曾就建国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留日学生的关系进行过论述。^②

(2) 以同学总会为中心的留日学生, 在战后总的来说呈现出左倾化趋势, 包括台湾学生在内的留日学生许多选择回到祖国大陆建设新中国, 所以对于中国留日学生的问题, 台湾学者的关心程度不高。虽然台湾“外交部”和“教育部”的档案已经大量公开, 但台湾方面的研究进展并不大。相反, 有关战后在日台湾华侨和留学生的研究却相当活跃。其主要代表作为陈来幸^③、许淑真^④、何义麟^⑤、

① 田中刚:《日本敗戦前後の中国人留日学生政策——汪精衛政権・“満州国”・“蒙疆政権”》,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現代中国研究センター研究報告:《長江流域社会の歴史景観》2013年10月, 第235—263页。

② 王雪萍:《留日学生の選択——“愛国”と“歴史”》, 刘杰、川岛真编:《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 第203—232页。王雪萍:《中華人民共和国初期の留学生・華僑帰国促進政策——中国の対日・対米二国間交渉過程分析を通じて》《中国21》(愛知大学現代中国学会) Vol. 33, 2010年7月, 第155—178页。王雪萍:《中国の対日政策における留日学生・華僑——人材確保・対日宣伝・対中支援》, 王雪萍编著:《戦後日中関係と廖承志——中国の知日派と対日政策》, 东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 2013年, 第107—131页。

③ 陈来幸:《戦後日本における華僑社会の再建と構造変化——台湾人の台頭と錯綜する東アジアの政治的帰属意識》, 小林道彦、中西寛编著:《歴史の桎梏を超えて——二〇世紀日中関係への新視点》, 东京:千倉書房, 2010年, 第189—210页。陈来幸:《在日台湾人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脱日本化——戦後神戸・大阪における華僑社会変容の諸契機》, 贵志俊彦编:《近代アジアの自画像と他者——地域社会と“外国人”問題》, 东京: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2011年, 第83—105页。陈来幸:《二战后的日本华侨社会与华侨教育——“新华侨”台湾人发挥的作用》, 载夏诚华主编:《僑民教育研究論文集》, 东京:玄壯大学出版, 2005年, 第137—157页。

④ 许淑真:《留日華僑總會の成立に就いて(一九四五—一九五二)——阪神華僑を中心として》, 山田信夫编:《日本華僑と文化摩擦》, 东京:巖南堂書店, 1983年, 第119—187页。

⑤ 何义麟:《战后在日台湾人之处境与认同:以蔡朝焯先生的经历为中心》, 载《台湾风物》第六十卷第四期, 2010年, 第161—194页。何义麟:《戦後台湾人留学生の活字メディアとその言論の左傾化》, 大里浩秋编:《戦後日本と中国・朝鮮——プランゲ文庫を一つの手がかりとして》, 东京:研文出版, 2013年, 第120—168页。

杨子震^①、许琼丰^②等的论文。

(3) 因为与同学总会有关的人员中许多持亲中共立场，并在日本从事华侨运动或回国，他们并不希望过多谈及与国府的关系。因此在许多同学总会成员的回忆录中关于同学总会的内容，或根本不触及与国府的关系，或只强调与国府对立的部分。^③

本文主要使用台湾的“国史馆”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中保存的中华民国外交部、教育部的相关档案史料，来分析战后初期留日学生与国府之关系。

一、战后留日学生的境遇

1937年抗战开始后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回国。根据川岛真真的调查，当时在留日学生监督处登记在册的450名留学生中领取回国旅费15日元回国的有200名。虽然当时回国的留日学生中，也有后来曾尝试再赴日留学的，但由于他们被日本政府怀疑为“抗日主导者”，所以要求他们必须持有中华民国新政府（汪伪政权）、地方治安维持会的推荐信或者日本在华公馆的证明信，否则难以再次赴日留学。所以能再赴日留学的中国学

① 杨子震：《帝国人民から在日華僑へ——渋谷事件と戦後初期在日台湾人の法的地位》，《日本台湾学会報》第14号，2012年6月10日，第70—88页。

② 许琼丰：《在日華僑の經濟秩序の再編——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五〇年までの神戸を中心に》，兵庫県立大学《星陵台論集》第41卷第3号，2009年1月，第115—148页。许琼丰：《戦後中華民国政府の華僑政策と神戸中華同文学校の再建》，《華僑華人研究》第6号，2009年11月，第63—80页。许琼丰：《戦後日本における華僑社会の再編過程に関する研究：在日台湾人と神戸華僑社会を中心に》，兵庫県立大学経済学研究科博士論文，2010年3月。许琼丰：《在日台湾人与日本神戸华侨的社会变迁》，《台湾史研究》第18卷第2期，2011年6月，第147—195页。

③ 《回国五十年》编写组编：《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北京：台海出版社，2003年。林连德：《中国留日同学总会侧记》，全国政协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397—404页。郭平坦：《留日同学会引导我们走爱国回国的道路》，全国政协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405—416页。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会：《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东京：日本僑報社，2004年。

生也已经不是国府派遣，而是享受亲日政权的公派留学生待遇^①。因为其后至1945年期间来到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各地的亲日政权管辖地区来的公费或私费留学生，所以可以推测，这些留日学生许多都是与亲日政权有关的人员或他们的亲属。当然，从台湾来的学生不在此列。根据日华学会的统计，从1938年至1944年在日中国留学生（不含伪满洲国政权）一直都保持在1000名至1500名的规模。^②

后来，随着空袭的恶化，许多留日学生回国了，剩下的一些留日学生也被强制疏散到外地。1946年5月，由驻日代表团送交教育部的名为《留日学生概况》的报告中，对于从1945年至1946年3月的留日学生的情况进行了以下说明：

“我国抗战前留日学生人数约在二万以上，抗战起后大部归国。伪组织成立，官公私费生复陆续东来，截至太平洋战前，数近五千。太平洋战启，一部分归国。民国三十二年中，合伪宁、伪满学生，总计约近三千。其中伪宁约二千，伪满近千。空袭开始，又纷纷返国。直至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强制疏散结果，伪宁学生，仅剩五百左右，伪满学生百名左右，蒙疆学生五、六十名左右。与今日之数，相差无几。今日除台湾籍学生外，各省留此学生总数，为四五六名。台湾籍学生，据台湾学生联盟之报告，为七六五名。合计现在留日学生总数为一二二一人。

抗战期间，各生除自费者外，学费来源约分四种：一、日政府与伪组织双方发给者；二、伪组织单独发给者；三、在中国之日军政机关供给者；四、中国之教育或社会机关派遣者。

日本投降后，中日汇兑断绝，学生自行向日本外务省交涉结果，日方允对于非日政府给费之大学以上官公私费生，每人每日给二百元，高等专门以上者，给百八十元，概称贷金。管费生之受补助费者，除日本原有负担部分外，对大学生学费补足成二百元，高专生补足成百八十元，其所补

^① 川岛真：《日本占领期华北における留日学生をめぐる動向》，大里浩秋、孙安石编著：《留学生派遣から見た近代日中関係史》，东京：御茶ノ水書房，2009年，第213—238页。

^② 周一川：《近代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71—272页。

足之额，亦称贷金。去秋以来，物价飞涨，本年一月，学生等又向日方作第二次之交涉，结果不论官公私费，不分大学、高专，每人每月改给五百元，其贷金与官费之分别计算，法一如前定。台湾籍以外之学生，一律照上述办法领费。台湾籍学生，则不由日外务省领费，而由日厚生省领费，每月每人领取百五十元”。^①

从以上的报告就可以看出，战后初期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留日学生虽然没有了来自原来派遣机关、祖国家人的汇款，但为了确保在日本学习和生活的费用，从日本战败到1946年1月他们自己与日本政府交涉，不仅获得了学费和生活补助金，还在物价上涨、生活再陷困苦之时再次与日本政府交涉而获取了进一步的援助。如此来自伪满洲国、蒙疆政权、汪伪政权统治地区的留日学生们在日本战败后很快就团结起来作为中华民国的留日学生运动并争取自身的权利。但是，台湾学生却与他们明显待遇不同。这是因为，作为日本殖民地台湾的华侨，在战后初期他们还没有得到中华民国的“战胜国国民”身份，而是被GHQ认定为“解放国民”的身份。^②战争结束之后，虽然由于汇款中断而曾一时陷入混乱，但大陆和台湾的留日学生依靠自己的努力大都从日本政府（外务省、厚生省）那里获得了生活补助。

同时关于战后留日学生人数的统计也是根据调查时期和调查机关的不同，其统计数字大相径庭。上文的报告书中提到了由驻日代表团统计的1946年5月当时的人数。与此相区别，表1和表2为1946年2月4日由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东京同学会制作、提交给国府教育部的《中华民国留日学生调查统计表》和1947年送达南京国府的驻日代表团为国府侨务委员会和教育部制作的《留日学生人数分布统计表》。从表1可以看出，1946年2月当时的东京同学会的统计中不包括台湾学生，同时来自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学生较多。从表2可以看出，留日学生分布在日本全国的22个都道府县，1947年5月当时基本上都集中在关东地区（东京附近）和关西地区（京都

^① 《驻日代表团张凤举函陈教育部留日学生概况及用费意见》，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台北：“国史馆”，2001年，第5—12页。

^② 外务省编：《日本占领重要文书》（第一卷基本编），东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89年，第112—166页。

大阪神户附近), 而在其他地方城市的学生则为数极少。

表1 中华民国留日学生调查统计表

	本籍统计		年龄统计	
	1	广东省	78名	15岁
2	河北省	76名	16岁	0名
3	辽宁省	43名	17岁	2名
4	福建省	36名	18岁	5名
5	江苏省	29名	19岁	11名
6	山东省	24名	20岁	21名
7	察哈尔省	18名	21岁	39名
8	湖北省	16名	22岁	54名
9	浙江省	13名	23岁	54名
10	绥远省	8名	24岁	59名
11	山西省	8名	25岁	51名
12	吉林省	6名	26岁	42名
13	黑龙江省	5名	27岁	24名
14	江西省	4名	28岁	13名
15	热河省	4名	29岁	9名
16	四川省	3名	30岁	6名
17	安徽省	3名	31岁	2名
18	湖南省	1名	32岁	0名
19	河南省	1名	33岁	0名
20	南省	1名	34岁	2名
21	贵州省	1名	35岁	0名
22	蒙古省	1名	36岁	0名
23	其他省	18名	37岁	1名
			不明	1名

续表

合计	397名	平均	23.8岁	
分类	华侨子弟 41名			
	台湾侨胞 16名			
	伪政府、日本政府、各团体官公费生 268名			
	男 367名 女 30名			
希望	迅速归国者 61名			
	毕业后归国者 298名			
	未定者 38名			

编制责任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东京同学会；制作日期：中华民国35年（1946年）2月4日；出处：台湾“国史馆”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留日学生》，入藏登录号020000030933A，典藏图像号020-010105-0033 0030a-0034a，1938年3月3日—1956年9月27日。

表2 留日学生人数分布统计表

地名	台省学生	其他各省学生	合计
东京	446	218	664
京都	52	103	155
神户	25	7	32
宫城	10	15	25
岩手	11	18	29
群马	1	0	1
茨海	4	3	7
秋田	2	5	7
鸟取	1	10	11
北海道	2	9	11
福冈	1	4	5
山梨	9	0	9
大阪	36	1	37

续表

地名	台省学生	其他各省学生	合计
新潟	8	1	9
冈山	2	0	2
奈良	0	8	8
山口	8	8	16
山形	4	4	8
千叶	1	12	13
北陆	0	7	7
鹿儿岛	1	0	1
丘崎	0	1	1
全日本	台省学生	624 名	合计 1058 名
	其他各省	434 名	

作成者：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

作成时间：根据 1947 年 5 月底以前的中华民国留日侨民登陆数据制作

出处：“国史馆”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留日学生》入藏登录号 020000030933A，典藏影像号 020-010105-0033-0071a~0072a，1938 年 3 月 3 日—1956 年 9 月 27 日。

将表 1 的 1946 年 2 月的数据与 1947 年 5 月的数据进行比较判断，就会发现留日学生的人数并没有随着遣返外国侨民而减少，反而有增加的倾向。笔者认为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虑：

(1) 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东京同学会的统计，是以东京为中心进行调查的，外地留日学生的情况掌握得并不充分，所以，很有可能是通过其后的调查，将原来一些未能统计进去的学生追加了进去。

(2) 因为作为留日学生登记以后就有可能从日本政府、GHQ、国府那里领取到救济金，所以以前各地没有在留日学生组织登记的学生为了领取救济金，也找到留日学生组织以留日学生的身份进行了登记。

(3) 在战争时期被疏散到外地的留日学生，在战争结束以后其中一部分回到了原来就读的大学或原来的居住地，一些未被统计的留日学生得以

被追加统计进去。

(4) 台湾的留日学生和华侨子弟的华侨学生，为了领取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的救济金、补助金，或者是从战胜国民优越感的角度，也到代表中华民国的留日学生团体进行了登记。

而表2所显示的1947年5月底当时的留日学生统计人数中台湾学生人数明显减少，可以推测为与后述留日学生的召回政策有关。

二、日本各地留日学生团体的林立与统合

如上所述，留日学生为了生计和学费，四处奔走，与日本政府协商，不分出身地区，不问官、公、私费的区分，也不区别大学和高专的不同，使广大范围的中国留日学生基本上都获得了被称之为“贷金”的生活补助金。反观这一系列交涉过程，可以看出这些活动不可能由个人去进行交涉，可以认为是一种有组织的活动成果。

战争期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有各自的组织，比如接受伪满洲国驻日大使监督的伪满洲国留学生组织“满洲国留日学生会”^①、以蒙疆和日本政府为后盾组织起来的“在日蒙古学生修养会”^②、在日华学会留学生教育部指导下设立的“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会”^③、作为抗日学生团体的“东亚青年抗日同盟”^④等。

然而，因为战后在中国大陆的伪政权、台湾的殖民地政府垮台，日本本身也成为战败国，所以中国大陆及台湾的留日学生开始组建与伪政权和日本政府无关的新团体。当然，战后日本的中国人团体的组建，并不是始

① 刘振生：《“満州国”日本留学生の派遣》，大里浩秋、孙安石编著：《留学生派遣から見た近代日中関係史》，东京：御茶ノ水書房，2009年，第153—193页。

② 祁建民：《善隣協会と近代内モンゴル留学生教育》，大里浩秋、孙安石编著：《留学生派遣から見た近代日中関係史》，东京：御茶ノ水書房，2009年，第195—212页。

③ 見城悌治：《一九四〇年における“中華民国留日学生会”の創設と日華学会》，《中国研究月報》Vol. 68, No. 10, 2014年10月号，第2—14页。《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会记事》，《日华学报》第82（1940年11月）号，第58—60页。

④ 周一川：《近代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第280页。

于留日学生，而主要是由日本各地的华侨开始的，留日学生的活动只是其中的一环。^①

1945年8月日本战败之后，在由台湾华侨发起的台湾同乡会成立的同时，统合台湾学生的组织也开始筹建。^② 根据何义麟的研究，台湾学生会自战败前就已经存在，虽然各个学生会之间的人员属于不同的学生组织，但各个学生组织之间已经存在着相互联络的网络。战后，成立一个能够统一管理台湾学生组织的必要性日益紧迫，于是各个学校的台湾学生会的代表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就组织的统合问题进行讨论和协商，并于1945年10月8日在东京女子大学讲堂举行了“台湾学生联盟”成立大会。决定把联盟活动地点设在清华寮（在东京的台湾学生宿舍），选出罗豫龙为第一期代表委员会的委员长。11月11日，发行了机关杂志《龙舌兰》的创刊号。^③

另一方面，在东京地区的大陆留日学生于1945年底成立了“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东京同学会”^④（以下：东京同学会）。东京同学会成立之后，北海道、盛冈、仙台、横滨、京都、大阪、神户、福冈、长崎等地的同学会也相继成立。1946年1月，东京同学会商议干部的构成，决定在选出博定为代表的同时，从台湾学生联盟中選人出任副代表。^⑤ 这一行动为全日本的大

① 许淑真：《留日華僑總會の成立に就いて（一九四五——一九五二）——阪神華僑を中心として》，山田信夫编：《日本華僑と文化摩擦》，东京：巖南堂書店，1983年，第119—187页。

② 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会：《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东京：日本僑報社，2004年，第54—56页。

③ 何义麟：《戦後台湾人留學生の活字メディアとその言論の左傾化》，大里浩秋编：《戦後日本と中国・朝鮮——プランゲ文庫を一つの手がかりとして》，东京：研文出版，2013年，第120—168页。

④ 关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东京同学会的成立日期，在何义麟：《战后在日台湾人之处境与认同：以蔡朝圻先生的经历为中心》（载《台湾风物》第60卷第4期，2010年）第161—194页，和川岛真：《過去の浄化と将来の選択——中国人・台湾人留學生》（刘杰·川岛真编：《一九四五年的历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第31—51页中记录为11月26日，但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会：《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东京：日本僑報社，2004年），第58页中则写为12月16日，所以其具体的成立日期仍需考证。

⑤ 川岛真：《過去の浄化と将来の選択——中国人・台湾人留學生》，刘杰·川岛真编：《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第31—51页。

陆和台湾留学生团体的统合迈出了第一步。其后以东京同学会为中心，日本全国各地的大陆和台湾的同学会组织开始共同筹建“中华民国留日同学总会”（同学总会）。在1946年5月22日同学总会的成立大会上，选东京同学会主席博定为同学总会主席，台湾学生联盟委员长罗豫龙为副主席，同时决定发行同学总会机关报《学生报》。在该成立大会上，驻日代表团第二组组长谢南光出席并致了祝辞。^①

同学总会成立的1946年5月，与驻日代表团的设立、中华民国留日华侨总会的成立时间十分接近。而统合了全日本大陆和台湾学生团体的同学总会的正式名称被定名为“中华民国留日同学总会”。再看同年4月统合了全日本华侨成立的团体的正式名称也被定名为“中华民国留日华侨总会”。由于两个团体名称的相似性，并且都被冠以“中华民国”之国名，所以不能否认留日学生和留日华侨成立全日本的统合团体的行为是与国府有关。许淑真关于中华民国留日华侨总会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解析了留日华侨与当时国府、驻日代表团的关系。^②但关于同学总会的既存研究，其重点多为分析学生、华侨的动向，但关于同学总会与国府的关系却极少提及。2014年春，田远提交的博士论文中，第一次涉及并分析了同学总会的成立与国府派往日本管理华侨相关业务的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刘增华之间的关系。根据田的分析指出，国府了解到当时留日华侨和留日学生的穷困状况，为了采取对策，于1945年12月决定派遣刘和其他三名职员赴日工作。刘于次年1月15日从重庆出发，于18日又被任命为“GHQ联络员”。刘到达日本之后不久的1月28日，同学总会发起人的联席恳谈会召开，并召集了为成立同学总会的预备会议，决定了组织名称和会章起草大纲。接着，在尚未正式成立之际，即以“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同学总会”名义向教育部发出了表效忠的信函。所以，田远推测同学总会的成立，是接受刘增华的提案之结果，认为同学总会也是作为中国留日学生团体中唯一被当时国府承认的团

^① 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会：《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第28—30页。

^② 许淑真：《留日華僑總会の成立に就いて（一九四五—一九五二）——阪神華僑を中心として》，山田信夫编：《日本華僑と文化摩擦》，东京：巖南堂書店，1983年，第119—187页。

体，成为负责管理留日学生事务的一个官方承认的团体。^①

但是同学总会的成立并不意味着日本全国的大陆和台湾留日学生团体的统合过程已经结束，正如东京的两岸学生组织于1946年12月才完成统合一样，各地同学会的成立，两岸学生团体的统合则用了更长的时间。关于此问题，何义麟分析认为各地同学会与同学总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基本上保持着相互联系的一种松散合作的关系。^②

三、关于救济问题国府与留日学生之间认识的错位

关于战后留日学生的境况，国府又是如何考虑的呢？在1945年12月，国府内部就已经开始就留日学生的救济问题进行讨论。笔者在对国府档案的调查范围内发现的战后关于留日学生救济问题的讨论，最初是从原留日学生北平市博爱医院院长金子直的呈情书开始的。其中讲到中日不能通汇留日学生已经陷入极其贫困的状况，如再不谋策，留日学生在日本即将陷入因无援助，饿死街头的危险。主张国府应从人道方面考虑，即便是从为了维护战胜国国民的威信考虑，也应该就关于留日学生的救济问题与美国当局协商，施行以在当地救济或协助其回国等援助，以免其冻饿致死。此呈情书呈送到北平行营李戌艳主任处，后来李主任将其转交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恳请采取适当对策。何应钦认为呈情书提出的救济方法可行，并在上面添加上“查此请似属可行”的附言，于1945年12月14日发给教育部长朱家骅，要求商议对策。^③何应钦的电报不仅送至于教育部，而且当

① 田远：《戦後直後における中国人留日学生の境遇と選択：1945—1952 主に〈中国留日学生報〉を通じて》，第50—68页。

② 何义麟：《戦後台湾人留学生の活字メディアとその言論の左傾化》，大里浩秋编：《戦後日本と中国・朝鮮——プランゲ文庫を一つの手がかりとして》，东京：研文出版，2013年，第120—168页。

③ 《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电教育部为留日学生生活困难请求救济请核办见复》，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台北：“国史馆”，2001年，第265—266页。

天同样的电报也从陆军总司令部发给了外交部长王世杰。^①

接到何应钦的电报以后，教育部内部讨论的结果，于四天后的同月 18 日致电外交部，要求外交部的驻日本人员对留日学生人数进行调查，委托他们开始与 GHQ 进行交涉，希望 GHQ 协助实现留日学生早期回国。从这一电报可以判断，当时教育部讨论的结果是比起对留日学生实行生活救济，更希望将他们尽快遣返。^②

接到何应钦电报的外交部东二科，于同月 18 日商讨给陆军司令部和外交部的回信电文，决定为了对留日学生、华侨进行救济，向日本派遣调查人员调查留日学生的情况，并敦促教育部商讨对策。送交教育部的电报中，同时将何应钦的电报也抄录在内，此份 18 日完成的电文发送到教育部的时间是同月 26 日。在此过程中，外交部 18 日又接到教育部的电报，该部东二科 26 日送交的电报中未写入的金子直的呈情及接到何应钦电报以后外交部讨论的结果，在 12 月 27 日完成电文，于 1946 年 1 月 5 日再次发给教育部作为回信。斟酌分析这两通电报的时间差可以认为，外交部之所以迅速决定为救济留日学生派遣人员赴日，主要是接受陆军司令何应钦的要求，并不是因为重视教育部的要求。关于这一点从发给何应钦与向教育部的电文的用词中可以读出。^③

另外从档案中还可以看出在留日学生问题上教育部和外交部有争夺主导权之倾向。上述 12 月 27 日就在外交部讨论书写给教育部的第二次回电的前一天（26 日），国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以回电方式发给教育部的电文中，传达了应该由外交部统一管理国外留学生事宜的意见^④。虽然教育部向军事

^① 台湾“国史馆”馆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留日学生》，人藏登录号 020000030933A，典藏影像号 020-010105-0033-0020x-0023x，1938 年 3 月 3 日—1956 年 9 月 27 日。

^② 台湾“国史馆”馆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留日学生》，人藏登录号 020000030933A，典藏影像号 020-010105-0033-0018x，1938 年 3 月 3 日—1956 年 9 月 27 日。

^③ 台湾“国史馆”馆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留日学生》，人藏登录号 020000030933A，典藏影像号 020-010105-0033-0019x-0023x，1938 年 3 月 3 日—1956 年 9 月 27 日。

^④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电复教育部关于留日学生之处理似应由外交部统筹办理》，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台北：“国史馆”，2001 年，第 1 页。

委员会发出的电文本身未能确认，但可以推测其内容是教育部希望主管留日学生之问题。当时，教育部并没有派员驻日，而且根据外交部的决定，为处理留日学生问题所派遣的人员也全部都是外交部职员这一事实本身，就有外交部希望主管本事务之意。关于争夺管理留日学生主导权问题，在后来还牵涉到日后设立管辖教育、文化、宣传的驻日代表团第四组的主管部门权限之争（后述）。

根据上述外交部的决定，刘增华等人的赴日终于得以实现。刘到日本以后，遍及日本全国的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学生团体准备统合的活动也逐渐活跃。但是，在刘增华等的调查尚未结束的1946年1月9日，教育部再次给陆军司令部发电，要求国府催促驻日官员与麦克阿瑟将军进行协商，并希望确认其就留日学生遣返问题协商的进展情况。从这份电文的内容也可看出教育部将迅速遣返留日学生放在最为优先位置上。^①

且不论是否知道教育部的意图，东京同学会于1946年2月4日经过调查，完成了《中华民国留日学生调查统计表》的编制工作。表1是调查统计表的一部分，除表1所示的项目以外，还有总结出在日本的大学、高中、专门学校、大学预科、大学预备部、高等师范学校、研究生院等在学的中国学生人数的调查结果。和表1的统计表相同日期的2月4日，以还未正式成立的中华民国留日同学总会名义写给教育部的信函中，阐述了学生们在抗日战争期间赴日本留学的理由为：“当时教授凡乎众望者，率皆迁入内地，所残留者，殆为非誉愚者流。故所学无非陈腐之空论，如拟攻研较新颖实际之学，唯易地求之。然内地及欧美各国，均以路阻，可通者，日本一处耳。且在经济方面，即较诸就地所费亦轻微，此实系留日之一大主因也”。而对在战中和战后未归国的问题列举理由如下：“抗战中之迁延不归，以归非其所不愿归也。今之未敢即云归，盖一以候命，一以归不得其所不敢骤归，而实则众志成城，归心似箭者也”。2月4日编制的统计表和同学总会的信函，均交由从美国归国途中绕道东京的外交部亚东司司长杨云竹

^① 《教育部电复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教部办理留日学生救济情形》，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267—268页。

带回，并于2月19日转交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同时，要求就相关问题与其面谈。^① 笔者在现在所能确认的资料中，尚未找到关于此次面谈结果的记录。

另外，金子直另送一份呈情书给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蒋读后于1946年2月22日通过行政院秘书处发出指令交由外交部核办。^②

接到该指令的外交部，3月5日向以GHQ专员身份驻日的刘增华发出电报，传达了行政院和蒋介石的指令，让刘立即与GHQ交涉，协助希望回国的留日学生尽快回国。同日，外交部也向行政院秘书处报告说明已经发出指示让驻日的刘增华与GHQ交涉，协助希望回国的学生回国。^③

如此可以看出在金子直提交呈情书之后，接到蒋介石、何应钦等国府领导的指令，外交部和教育部迅速行动，向日本派遣人员，决定了协助留日学生的回国的方案。但是留日学生们真的希望回国吗？

关于日本战败前后至1946年这段时期留学生的实际状况，田中刚利用日本的外交档案和中华民国的外交部档案已经进行了大致的分析。根据田中的调查，在战争刚结束之时，留日学生总体上一如既往仍在继续上学，真正希望立即回国的学生并不多。但到1945年9月20日外务省调查时，却了解到来自中国大陆的留日学生中多数希望回国。此时他们转为希望回国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战败以后日本人对留日学生的态度变得冷淡，而且随着物价上涨，从日本政府领取到的“贷金”又不足以维持生计。根据此调查结果日本政府考虑到日本国内的经济情况、在日留学生与日本人的关系等问题于同年10月22日制定了《关于留日学生归国问题（留日学生归国ニ関スル件）》的文件，转变政策为积极引导外国人留学生回国。此后，关

^① 台湾“国史馆”馆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留日学生》，入藏登录号020000030933A，典藏影像号020-010105-0033-0029a-0035a，1938年3月3日—1956年9月27日。《外交部杨云竹函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为转陈留日学生呈及留日学生调查统计表》，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1—4页。

^② 台湾“国史馆”馆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留日学生》，入藏登录号020000030933A，典藏影像号020-010105-0033-0024x-0026x，1938年3月3日—1956年9月27日。

^③ 台湾“国史馆”馆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留日学生》，入藏登录号020000030933A，典藏影像号020-010105-0033-0027x-0028x，1938年3月3日—1956年9月27日。

于中国留日学生的回国问题，外务省制定了《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归国斡旋要领》，规定对于归国的留学生，不仅准备好归国船，更为他们准备了从居住地到乘船地的交通、在乘船日以前的住宿、在船上伙食配给，甚至连从居住地至乘船地乘车途中用的面包、罐头都一律提供，另外还支付每人1000日元为上限的“归国旅费”。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日本政府是真正地在积极推进协助留日学生归国的政策。然而，送留学生回上海的“第一次输送计划书”（从10月至11月）中显示的当年年内希望回国之人仅有9名。其后12月通过日华协会募集希望回国的中国留学生时，发现希望回国的也是“出乎意外的少”，在其后的报告中显示实际上最后回国的总共也只有十几人。根据田中分析，留日学生之所以不希望回国，主要可能是因为担心自己与战时的伪政权有关。^①

的确，从表1东京同学会总结统计出来的留日学生的情况看，1946年2月这一阶段希望迅速回国的仅有61名，只占397名之中的15%。分析留日学生不希望尽快回国的原因，从表1的留学生构成中也能看出一些端倪。例如，397名中，有268名属于伪政权、日本政府等各团体的官费生或公费生。这些官费生或公费生，多数与伪政权有着较深的渊源，因为他们在日本国内已经接触到国内的关于审判汉奸的信息，所以也就不难想象他们在回国问题上处于犹豫不决之状态了。关于这些想法，从上文所述的1946年2月以同学总会名义写给教育部的信函中也可以读出。^②

那么，在留日学生并不是特别希望回国的情况下，金子直为何又要向国府高层提交那样的呈情书呢？据田远的分析，向金要求援助的很可能是来自大陆的留日学生，他们可能是希望把其生活贫困的情况通过与国府高层关系密切的金子直向国府转达来申请生活经费方面的援助。然而，事与

^① 田中刚：《日本敗戦前後の中国人留日学生政策——汪精衛政権・“満州国”・“蒙疆政権”》，第235—263页。

^② 台湾“国史馆”馆所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留日学生》，入藏登录号020000030933A，典藏影像号020-010105-0033-0029a—0035a，1938年3月3日—1956年9月27日。《外交部杨云竹函教育部长朱家骅为转陈留日学生呈及留日学生调查统计表》，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1—4页。

愿违，国府教育部和外交部因为经费和汇款障碍等问题，并没有考虑给留日学生救济经费，而是决定与 GHQ 协商，将他们尽快遣返回国。

之后，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在准备将留日学生全员遣返回国的消息在日本被广泛传播开来。其程度到了驻日代表团 1946 年 6 月不得不急忙向外交部和教育部确认，并采取措施辟谣来平息流言。^① 根据后来驻日代表团的调查，也确实了解到了留日学生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回国的事实。^② 综上所述可以了解到留日学生对回国的愿望从战争结束之初到 1946 年春夏这段时期，一直是随着当时日本与中国的国内外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可以说国府并没能在各个时间段及时了解到留学生们心态的变化。

四、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的设立与留日学生的管理

(一) 驻日代表团中管辖留日学生问题的部门

驻日代表团正式设置于 1946 年 5 月，^③ 但其第一、二、三组的负责人在 4 月已经到日本赴任并开始工作。在驻日代表团到日本之时，在日本的国府的机关已经有外交部派的“驻日办事处”和“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GHQ）军事联络办事处”，此外还有以远东委员会中国代表身份赴日的国府官员^④。另外，根据 1946 年 2 月 6 日中华民国外交部发出的任免命令，驻日代表团第一任团长朱世明赴任日本时的官衔是“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

^① 台湾“国史馆”馆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留日学生》，典藏登录号 020000030933A，典藏影像号 020-010105-0033-0041a-0043x，1938 年 3 月 3 日—1956 年 9 月 27 日。

^② 《驻日代表团张凤举函行政副院长朱家骅呈救济留日学生办法请行政院及教育部核准经费》，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 274—280 页。

^③ 《驻日代表团 全宗》介绍，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网站，<http://archdsu.mh.sinica.edu.tw/filekmc/ttsfile3?4:1953652415:19:::12@@1537944152>，2014 年 9 月 4 日阅览。

^④ 杨子震：《帝国人民から在日華僑へ——渋谷事件と戦後初期在日台湾人の法的地位》，《日本台湾学会報》第 14 号，2012 年 6 月 10 日，第 70—88 页。

表”。^① 在驻日代表团赴日以前，国府在日本已有一些代表驻留并主管着一些业务。驻日代表团到日本后，以前国府的代表的一部分功能被驻日代表团所吸收。例如，前述的刘增华后来就以职员身份被调任至驻日代表团侨务处工作。^②

驻日代表团赴日初期，由第二组负责政治和教育工作，但因为没有专门负责教育、文化、宣传方面的部门，同年7月在驻日代表团组织内部开始筹备成立一个专门负责上述业务的部门，就是设立一个新的第四组。第四组作为一个组的形式出现是在8月份，但其业务逐渐步上正轨还需要一些时间。从外交部人事处的关于留日学生管理部门的意见的档案中可以了解到在7月这一阶段，第二组和第四组中都有从教育部派来的人员这一情况。^③

由此可知在1946年7月当时还没有一个专门负责留日学生问题的部门。但是，因为后续的就留日学生救济问题与GHQ、日本政府的交涉进展困难，进而推进召回留日学生政策的过程中，有关留日学生的救济和回国业务迅速增加。驻日代表团、外交部和教育部的三个部门也不得不讨论此项业务到底应该归哪个部门管辖了。三部门从7月至8月的协商结果，由外交部于8月22日向驻日代表团朱世明团长发出电报说明暂定由驻日代表团侨务处兼管留日学生的问题，教育部也表示同意。^④

由以上过程可以了解，最初留日学生相关业务处于由侨务处、第四组、第二组分别管辖的混乱状况。从驻日代表团的这三个部门的档案中都可以发现一些关于留日学生的内容，但在第四组业务逐渐步入正轨的1946年秋

^① 台湾“国史馆”馆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驻日代表团任免》，入藏登录号001000002957A，典藏影像号001032134001002a，1946年2月8日—1948年5月19日。

^② 许琼丰：《戦後日本における華僑社会の再編過程に関する研究：在日台湾人と神戸華僑社会を中心に》，第77页。

^③ 台湾“国史馆”馆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留日学生》，入藏登录号020000030933A，典藏影像号020-010105-0033-0045a-0051a，1938年3月3日—1956年9月27日。台湾“国史馆”馆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驻日代表团第三组工作报告》，入藏登录号020000001227A，典藏影像号020-010121-0008-0237a-0241a，1947年5月5日—1948年8月18日。

^④ 台湾“国史馆”馆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留日学生》，入藏登录号020000030933A，典藏影像号020-010105-0033-0041a-0051a，1938年3月3日—1956年9月27日。

天以后，有关留日学生的业务也逐渐转移到了第四组。但是因为留日学生的问题，与政治、战后赔偿、华侨的关系都密切相关，相关问题发生之时，有关留日学生的相关内容在第四组以外的部门的档案中也时常可以看到。

同时在留日学生相关业务转移到第四组的过程中，也能看出围绕驻日代表团管辖部门的问题在国府各部门之间也存在着权力斗争。作为教育部官员从第四组设立之初就负责留学生业务的张凤举，在1946年7月30日给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信中提到：“因目下此间第一组，系国防部与参谋部主持；第二组外交部主持；第三组经济部与资源委员会主持也。如第四组能完全由我部主持，以后弟办事即可较感便利”，讲述了驻日代表团中因为没有教育部主管的部门所带来的工作不便，建议朱家骅争取主管第四组业务的权限。^①因为笔者未能找到对此信的回信，所以不能对朱部长和教育部的考虑妄作揣测，但从侨务处主管的有关留日华侨的报纸、华侨学校的相关业务其后也逐渐转移到第四组，和有时第四组不通过外交部直接向教育部汇报并征求意见的行为来看，可以认为张的建议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了。^②

但是，关于留日学生的相关业务，在1950年驻日代表团被改组后，又经过了一次和华侨学校等的业务一起再次移交到第二组的过程。^③

（二）在救济与召回夹缝中摇摆不定的国府留学生政策

驻日代表团赴日以后不久留日学生的救济问题就浮上了台面。如上所述，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对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留日学生虽然金额有所不同，但还都支付给他们被称作“贷金”的补助金。然而，1946年4月15日驻日代表团的朱世明、李济、张凤举向重庆的教育部朱部长、杭次长发电

^① 《驻日代表团张凤举函陈教育部长朱家骅留日台籍学生留学经费等八项事》，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21—24页。

^②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驻日代表团侨务处工作报告》，档号11-01-02-19-04-009，旧档案号11-EAP-02208，1946年1月—1950年12月。台湾“国史馆”馆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驻日代表团第三组工作报告》，入藏登录号020000001227A，1947年5月5日—1948年8月18日。

^③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驻日代表团一般业务报告》，档号11-01-02-19-04-002，旧档案号11-EAP-02201，1950年1月—1951年5月。

报，传达了日本政府以经费问题为由，向驻日代表团提出以后不能再继续向留日学生发放补助金，并要求驻日代表团采取相应措施解决留日学生的救济问题。另外，还介绍了在留日学生之中，有愿归国转学者和有愿留在日本毕业者。其要求政府四事为：“一，承认其学籍；二，对继续求学之前官费生给予官费；三，对归国学生给予川资及便利；四，对转学生准其转学”。^①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在驻日代表团到任不久就提出了要求国府方面接替日方负责解决留日学生的生活问题。

其后驻日代表团在争求外交部、教育部意见的同时，在同年11月之前与GHQ和日本政府反复进行了多次协商。由于中国的法币与日元不能直接兑换和汇款，为救济留日学生每月需要30万日元，用美元换算为2万美元。驻日代表团要求教育部提供这笔经费，但却未能如愿，只能在日本国内寻求对策。其后在与日方反复交涉之后，日本政府虽然同意向台湾学生发放补助金到6月，向大陆学生发放到9月，但其后这两项补助金也都停发了。^②

接着，驻日代表团又向GHQ提出希望与日本政府协商以下两个方案。其一是利用庚子赔款日本部分解决此问题，其二是让日本政府先垫付日币二千万日元，作留日学生费用，且言明此款，将于日本对中国赔款或中国在日财产内扣去。但这两项提案后均被否决。首先因为庚子赔款问题情况复杂，而且关于此案之一部分文卷已于战时损失，再要求日本政府提供相关资料后，就看不到任何进展了。而关于让日本政府垫付二千万日元之事，GHQ认为这不属于他们的权限之内，关于中华民国之留日学生，GHQ则建议其应全部遣返回国。尽管此两项提案未果，但驻日代表团此后仍再次要

^① 《驻日代表团朱世明李济张凤举电外交部转教育部长朱家骅留日学生要求政府四事应如何善后乞电示》，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5页。

^② 《驻日代表团张凤举函陈教育部留日学生概况及用费意见》，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5—12页。《驻日代表团张凤举函陈教育部长朱家骅留日台籍学生留学经费等八项事》，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21—24页。台湾“国史馆”馆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驻日代表团第三组工作报告》，入藏登录号020000001227A，典藏影像号020-010121-0008-0246a—0247a，1947年5月5日—1948年8月18日。

求 GHQ 与日本政府交涉，希望日方提供每月 50 万日元的临时救济费用，但对于此项要求日本政府仍然未予同意。之后，驻日代表团在没有任何办法的情况下再次向国府教育部请示对策，但直至 1949 年春天都未能得到任何关于救济方法的答复。

另一方面，从 1946 年至 1947 年期间，包括台湾学生在内的留日学生作为中华民国战胜国国民的身份登记完成后，也已开始领取发给战胜国国民的特别配给食品等，据说许多学生不得不依靠变卖这些食品生活。^① 但即使如此日本政府还是于 1949 年 5 月以消减预算为由一律停止发放特别配给。另外本来驻日代表团与日本援助留学生团体的有邻学会进行协商的结果，来自大陆的一部分留日学生可以从有邻学会每月领取 500 日元，但此项补助的 500 日元也于同年 6 月停止了。^②

关于留日学生的救济问题之所以从驻日代表团开始着手处理以后经过三年仍不见任何进展，其原因除了 GHQ、日本政府、国府之间围绕经费负担问题互相争论以外，还与在其争论期间国府还在另行讨论召回留日学生之政策有关。

关于在上文第三节中介绍的关于召回全部留日学生的流言，1946 年 6 月 15 日驻日代表团通过外交部向教育部进行确认，三天之后教育部经外交部给驻日代表团的回答是“无此决定”。^③ 但是正所谓无风不起浪，此传言并非凭空而起。在 1946 年 6 月中旬以前的一段时间，关于召回留日学生的问题，驻日代表团的朱世明、张凤举、徐逸樵与陈果夫、教育部长朱家骅之间就已经通过信函就解决留日学生问题的方法进行过数次协商。特别是

① 《学生への特配》，《中華留日学生報》1947 年 5 月 1 日。

② 《驻日代表团张凤举函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检呈救济留日学生办法请行政委员及教育部核准经费》，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 274—280 页。台湾“国史馆”馆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驻日代表团第三组工作报告》，入藏登录号 02000001227A，典藏影像号 020-010121-0008-0246a—0247a，1947 年 5 月 5 日—1948 年 8 月 18 日。许淑真：《留日華僑總會の成立に就いて（一九四五——一九五二）——阪神華僑を中心として》，山田信夫编：《日本華僑と文化摩擦》，第 119—187 页。

③ 台湾“国史馆”馆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留日学生》，入藏登录号 020000030933A，典藏影像号 020-010105-0033-0041a—0043a，1938 年 3 月 3 日—1956 年 9 月 27 日。

教育部长朱家骅6月13日给陈果夫的信函中就曾表明其意见为“经即函商朱世明兄，请由中国驻日代表团内核发经费，对于成绩佳者予以救济，俾得完成学业；成绩太差者，则设法遣令回国”。^①

同年6月29日外交部收到了驻日代表团徐逸樵关于留日学生的建议。徐关于留日学生的处理方法，向外交部提出以下四项原则：一，实科以外学生，不妨一律资遣回国；二，实科学生成绩优秀者，似可留待毕业；三，资遣回国学生，必须经过一定期间严正之补习教育，然后分别准其抽入相当学籍；四，台湾学生大抵须有较长时间补习国语之机会，不然实与日本学生无大分别”。接到徐的提案以后，外交部长王世杰即令亚东司商讨对策，同时于7月2日抄送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希望教育部亦研究对策。^②

对此教育部于7月16日和18日两次发出公函回复外交部，表示正在让相关部门研讨徐的建议，并向外交部说明关于召回留日学生的具体办法正在研究中。^③由教育部拟订的《抗战期间留日学生甄审办法草案》和《留日学生召回办法草案》两个文件8月26日提交到行政院审核。^④

^① 《驻日代表团朱世明函教育部朱家骅留日学生接济事日方表示七月以后由中国自筹办法已由张凤举向盟军磋商》，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12—13页。《陈果夫函教育部长朱家骅为驻日代表团徐逸樵来函表示留日学生似宜速定方针从事处理》，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13页。《教育部长朱家骅函复陈果夫关于留日学生事已函商朱世明请由驻日代表团内核拨经费对于成绩佳者予以救济成绩太差者则设法遣令回国》，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14页。

^② 台湾“国史馆”馆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留日学生》，入藏登录号020000030933A，典藏影像号020-010105-0033-0056a—0059a，1938年3月3日—1956年9月27日。《外交部王世杰函教育部拟驻日代表团徐逸樵来函建议处理留日学生四点办法》，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17—18页。

^③ 台湾“国史馆”馆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留日学生》，入藏登录号020000030933A，典藏影像号020-010105-0033-0044x，1938年3月3日—1956年9月27日。《教育部长朱家骅函外交部王世杰关于处理留日学生问题复请查照》，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20页。

^④ 《教育部呈行政院检呈抗战期间留日学生甄审办法及留日学生召回办法草案等件请鉴核示遵》，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63—64页。

教育部内部经过近三个月的研讨，10月19日电复驻日代表团表示教育部拟订的《留日学生学籍学业处理办法》中规定留日学生，必须参加甄审考试。其返国入学或转学者，须具备甄审及格证，方可投考学校。此时，教育部提出的留日学生处理方案中，关于留日学生继续留学的学费问题，要求驻日代表团仍与日本政府交涉先由日方垫付，将来在赔款项下扣算。但也可以看出教育部政策之重点为如何处理召回之留日学生。^①

但是教育部在8月向行政院提出的申请仍未得到回信的情况下，进入11月以后，又从驻日代表团传来两个坏消息。第一个是11月1日教育部收到的张凤举发来的电报，报告了与日本政府的交涉，并未达到预期的结果，而驻日代表团也无法解决救济留日学生的经费问题。考虑到留日学生的生活状况，不得不开始做将他们遣返回国的准备。^②第二个是关于教育部方案中对留日学生实施甄别考试的问题，在驻日代表团讨论的结果，因为学生们的居住地遍及日本全国，而且专业也各种各样，需要组织不同领域的考试委员会在各地进行考试，所以需要一大笔经费，另外还有许多留日学生汉语水平有限，能否应考中文一科之任务亦有问题。所以作为第二方案，提出组织审查委员会，以学生的生活状况、本人的在校学习成绩、品行操守为审查标准进行甄审之做法。这一方案，虽然有学校不同标准难甄严密等问题，但以手续简单较易办理为由予以推荐。^③

由于与日本政府、GHQ进行交涉都未能解决救济留日学生的资金问题，而甄审考试在日本操作起来也具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教育部即进一步加速商讨召回留日学生的办法。而提交给行政院的《抗战期间留日学生甄审办法草案》和《留日学生召回办法草案》也终于于12月18日收到审核意见，并于1947年1月公布了《抗战期间留日学生甄审办法》”和《留日学生召

^① 《教育部长朱家骅函复驻日代表团张凤举关于召回留日学生各点》，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27—29页。

^② 《驻日代表团张凤举电报教育部长朱家骅留日学生回国事项》，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31—32页。

^③ 台湾“国史馆”馆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留日学生》，入藏登录号020000030933A，典藏影像号020-010105-0033-0092x—0093x，1938年3月3日—1956年9月27日。

回办法》^①。

从该办法的内容看，对留日学生的甄审范围，在当时仍在日本留学的学生的基础上还加上了抗战期间留学并已经回国的留学生。另外，甄审委员会并不是设置在驻日代表团内，而是在教育部下设置，对回国后的留日学生进行审查。关于召回留日学生的范围则规定为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之一者即召回之：一，学业已告完成或已告一段落者；二，无力自行继续留学；三，其他特殊原因者。从此三条件也可以解释为，对于尚未毕业，而且能够自行解决继续留学费用的学生，可以不被强制遣返回国。但在当时中日两国之间不能汇兑的情况下，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留学的中国学生实际上是少之又少，所以从留日学生的立场来看，此项规定也可以说具有一定强制性。^②

特别是其中与留日学生救济金问题相关的以下条款，让留日学生感觉其确实有些过于严苛。“应行召回之留日学生，在未返国前，因汇兑不通或津贴不足，所必需之生活费，经查属实者，依照实在情形按月核给救济费。救济期限，至各该生离日返国时止。应行召回之留日学生，不遵照本办法规定返国者，停止核发其救济费。于必要时，得勒令返国”。^③ 按此规定对照召回范围，从学校毕业、或者无力自行继续留学的学生，不服从召回办法的回国者，即不支給救济金。这些规定对于在当时还没有与国府建立起信赖关系，且尚未下定决心回国的大陆留日学生来说，可以说是相当严苛的。这也就是从1947年以后，以同学总会为中心，留日学生们寻求救济支援的对象不仅限于驻日代表团，而是更多转向向留日华侨团体或向某些

^① 《行政院令教育部拟呈送抗战期间留日学生甄审办法等件准予备案》，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64—65页。《教育部令公布制定抗战期间留日学生甄审及留日学生召回办法》，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65—69页。

^② 《学生召喚どうなる》，《中華留日学生報》1947年5月1日。对原留日学生郭承敏的采访，2011年9月21日，天津。

^③ 《教育部令公布制定抗战期间留日学生甄审及留日学生召回办法》，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65—69页。

个人求助的原因了。^①

但无论如何，在上述办法公布后，至少对希望回国的留日学生，总算是增加了实现其尽快回国愿望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在召回办法中规定了“应行召回之留日学生，由日返国之交通工具，由教育部统筹之；其无法自筹船资者，得申请教育部予以补助”。此后确实也预定回国的留日学生名单，为召回留日学生制订的预算案也由驻日代表团送交到了教育部。^②在国内教育部也制作完成了《留日学生资格甄审委员会组织规程》，还决定了留日学生资格甄审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从表面上看来准备工作已经在有序地推进了。^③

可是没想到此后召回用的经费突然成了问题。教育部1947年5月和6月两次向行政院申请了留日学生的召回用经费。对此，行政院于同年6月24日下达了以行政院院长张群名义签署的“呈件均悉。查该项留日学生，应由驻日代表团设法使其搭运我国易货物资船只回国，所请外汇应勿庸议，除经电驻日代表团外，仰即知照”的指示。^④

该决定送达驻日代表团的时间是8月26日。驻日代表团虽然对此决定深感困惑，但还是探讨了执行该决定的具体办法。然而，即便是搭乘货船到上海，众多的留日学生到达上海之后的旅费筹措问题依然存在。而无力

① 王雪萍：《戦後期日本における中国人留学生の生活難と政治姿勢をめぐる葛藤——救済金問題を事例に》，大里浩秋编：《戦後日本と中国・朝鮮——プランケ文庫を一つの手がかりとして》，第83—119页。

② 台湾“国史馆”馆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驻日代表团第三组工作报告》，入藏登录号020000001227A，典藏影像号020-010121-0008-0250a，1947年5月5日—1948年8月18日。《驻日代表团电教育部造具三十六年度应行召回之留学生经费概算表三份请监核转呈赐拨》，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73—75页。

③ 《教育部令公布留日学生资格甄审委员会组织规程》，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76—77页。《留日学生资格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各委员与留日学生资格甄审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函请出席》，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78—80页。

④ 《行政院指令教育部留日学生应由驻日代表团设法使其搭运我国易货物资船只回国所请结拨召回经费外汇应毋庸议》，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84页。

自筹此项补助费用的驻日代表团于1948年7月11日再次向外交部和教育部申请了预算，但仍然未能解决学生归国经费的问题。但是有关台湾学生的问题，由于台湾省答应对于回台后的留日学生的升学问题等给予便利，169名台湾学生乘坐运送赔偿物资的船只成功回到台湾。在1949年6月当时驻日代表团关于留日学生的进展情况做了如上报告。^①

受挫于经费问题，关于留日学生的救济、召回问题等迟迟没有得到进展，可以说在驻日代表团赴日工作已经过了三年的时候，此项问题依然处于毫无进展的状态。也可以说此等无能表现让驻日代表团在留日学生的心目中威望扫地。

但是1949年6月以后，驻日代表团突然开始重新探讨留日学生的救济金问题。这是因为，在国共内战中国府已经明显处于劣势，重新讨论救济金问题是为了将已经明显表现出左倾亲中共倾向的留日学生再次吸引到国府一方来。^②

如前所述，留日学生生活最困难的时期不是在战争刚结束时，而是在1949年春天战胜国国民特别配给及有邻学会的援助完全停发以后。这一时期，同学总会为了解决留日学生救济金问题与驻日代表团交涉了多次，最后驻日代表团终于想办法筹措到经费，从1949年11月开始向包括同学总会干部在内的留日学生支付补助金。^③但因为补助金的发放主导权被牢牢握在驻日代表团手中，使同学总会与驻日代表团的关系恶化到了决裂边缘。其最后的结局是，包括同学总会干部在内的领取了驻日代表团补助金的留日学生的亲中共姿态完全没有改观，使败逃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倍感失望。其后导致1950年驻日代表团改组，1952年留日学生救济金的停发。在1952年驻日代表团补助金停发以后，以廖承志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侨务委员

^① 《驻日代表团张凤举函行政副院长朱家骅呈救济留日学生办法请行政院及教育部核准经费》，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274—280页。

^② 《驻日代表团张凤举函行政副院长朱家骅呈救济留日学生办法请行政院及教育部核准经费》，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274—280页。

^③ 《驻日代表团电报教育部办理留日学生救济经过情形》，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302—304页。

会给同学总会寄来了救济金，留日学生的亲中共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关于此过程笔者在其他论文中已有详述，这里不再赘述。^①

结 语

留日学生与华侨不同，由于在日本没有生活基础，在来自祖国的汇款断绝之后，他们的生活陷入极为穷困的境地，但因为与伪政权关系等政治上的理由，其中对回国态度犹豫之人甚多。但因为他们在日本不能维持生计的境况有可能影响到作为战胜国国民的威信，所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府决定制定政策将留日学生召回。在国府做此决定的过程中也考虑到了GHQ和日本政府的意见。但是此召回政策，进一步增强了在回国问题上处于犹豫不决状态下的留日学生们对国府的不信任感。而对于希望回国的学生来说，由于补助旅费等筹措资金问题迟迟不能得到解决，他们对国府的无能也深感失望。其后又发生了“涩谷事件”“二·二八事件”等，使台湾华侨和留学生对国府及驻日代表团的抵触心理越发高涨。其结果，以台湾学生和华侨为中心，留日学生、华侨的左倾化进一步加强。^②

但是也不能就此完全否定国府当时制定此政策之举措。如果站在国府立场上来考虑，从1946年6月至7月间，日本政府停止向台湾学生发补助金，大陆学生的补助金也即将停发，在此情况下，以台湾学生为中心的留日学生希望回国的呼声确实有所提高。同时此时台湾学生和华侨恢复中华民国国籍之事也进展顺利，华侨登记手续如期推进，这也是日本厚生省停

^① 王雪萍：《戦後期日本における中国人留学生の生活難と政治姿勢をめぐる葛藤——救済金問題を事例に》，大里浩秋编：《戦後日本と中国・朝鮮——プランゲ文庫を一つの手がかりとして》，第83—119页。王炳根：《吴文藻、冰心日本归国记》，载《档案春秋》2013年9月，第24—28页。

^② 杨子震：《帝国人民から在日華僑へ——渋谷事件と戦後初期在日台湾人の法的地位》，《日本台湾学会報》第14号，2012年6月10日，第70—88页。何义麟：《二·二八事件：“台湾人”形成のエスノポリティクス》，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3年。何义麟：《戦後台湾人留学生の活字メディアとその言論の左傾化》，大里浩秋编：《戦後日本と中国・朝鮮——プランゲ文庫を一つの手がかりとして》，第120—168页。

止发放给台湾籍学生的补助金的原因之一。另外与大陆学生不同，台湾学生基于台湾曾是日本殖民地的历史，被视为汉奸的可能性较低，所以他们对回台湾并无抵触。^①而且当时驻日代表团在留日学生、华侨问题上十分尽力，并正值台湾华侨恢复中华民国国籍的高峰，也是驻日代表团与台湾留日学生、华侨关系的最佳状态。在此时间点上，国府制定留日学生召回政策，以其的角度来考虑，可以认为有一定的合理性。

国府方面的问题在于教育部从一开始就没想出这一笔经费，关于经费问题始终寄希望于向行政院申请或让驻日代表团在日本筹措。当知道不可能筹集到救济留日学生的经费之后，教育部即转为努力推进不需要太多经费的召回政策上。然而其后教育部、行政院连留日学生的回国旅费也筹措不出，最后不得不推出让学生搭乘贸易货船回国这种拙劣的方案。其后在内战吃紧的情况下，国府连到达中国港口以后的留日学生回家的些许旅费也支付不出，而导致了大陆学生的召回政策陷入全面停顿的状态。

另外1947年以后救济金问题迟迟不见进展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由于与李香兰关系的问题，其团长职务突然被解职。商震接任团长以后，驻日代表团进一步腐败，对救济留日学生的问题漠不关心也是原因之一。^②关于这一问题，因为史料不足目前暂时难以深入分析，留作今后的课题。

在留日学生救济金问题上驻日代表团所显示出来的无能和腐败，致使同学总会全面倒向中共。而《学生报》的左倾化及对代表团的批判报道，使驻日代表团与同学总会的关系陷入僵局，逐步成为不可调节并难以改善的状态，1949年以后在留日学生救济和召回的问题上驻日代表团和同学总

^① 杨子震：《帝国人民から在日華僑へ——渋谷事件と戦後初期在日台湾人の法的地位》，《日本台湾学会報》第14号，2012年6月10日，第70—88页。台湾“国史馆”馆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在外台侨国籍问题》，入藏登录号020000001134A，1945年10月16日—1948年8月28日。《驻日代表团张凤举函陈教育部长朱家骅留日台籍学生留学经费等八项事》，载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日本事务（一）》，第21—24页。

^② 王炳根：《吴文藻、冰心日本归国记》，载《档案春秋》2013年9月，第24—28页。杨子震：《中国驻日代表团研究——初探战后中日·台日关系之二元架构》，载《国史馆馆刊》第19期，2009年3月，第51—85页。

会的对立状态可以说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①。同时在国共内战中，解放军节节胜利，最终导致同学总会于1949年10月将原来为庆祝“中华民国”双十节的庆祝大会改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集会^②。


① 王雪萍：《戦後期日本における中国人留學生の生活難と政治姿勢をめぐる葛藤——救済金問題を事例に》，大里浩秋編：《戦後日本と中国・朝鮮——プランゲ文庫を一つの手がかりとして》，第83—119页。王炳根：《吴文藻、冰心日本归国记》，载《档案春秋》2013年9月，第24—28页。

② 王雪萍：《留日學生の選択——“愛国”と“歴史”》，刘杰·川岛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第203—232页。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第九辑

徐 蓝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第9辑/徐蓝主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012-5300-5

I. ①近… II. ①徐… III. ①国际关系史—研究—近
现代 IV. ①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1307 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狄安略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马莉娜

书 名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第九辑)
Jinxiandai Guoji Guanxishi Yanjiu
主 编 徐 蓝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 ishizhi. cn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87×1092 毫米 1/16 21 印张
字 数 38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10 月第一版 201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300-5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